

开女师设教之先的班昭

□ 赵秉政

中华浩浩五千年文明史，风流人物灿若繁星，女性人杰尤为耀眼。中国古代第一位女教育家班昭，就是其中的佼佼者，宋人有诗称其“文章操行美俱全”。

在今人的印象中，古代掌握知识、为人师表似乎是男人的“专利”，其实，女子设教，自古有之。先秦时期，《诗·周南·葛覃》就有“言告师氏，言告言归”的记载，“师氏”便是门庭管家，汉代《毛诗》将其解释为“女师”——古代教授妇德、妇言、妇容、妇功的女老师。“女师”之称，是当时社会对女子从教的肯定和认可。汉代“独尊儒术”后，产生了许多经学世家，家庭教育的熏陶涌现出许多知识女性，才女辈出，如卓文君、蔡文姬、唐山夫人、徐淑等，“女师”也有了一定的实践基础，作为历史上第一位女教育家的班昭，诞生在这样一个时代也便不足为奇了。

承长兄遗志，东观续《汉书》

班昭（约公元49—120年），生于儒学世家，是班彪之女，班固、班超之妹。西汉成帝之妃班婕妤是班昭的姑祖母，班婕妤以辞赋见长，深得成帝宠爱。正是这层外戚关系，班昭的祖父一辈得以在汉廷出任要职，班氏一门也成为两汉之际的显族，史称“家有藏书，内足于财”。班昭的父亲班彪是东汉著名儒学大师，专注于史学著述，续《史记》60篇；长兄班固在继承父亲所搜集史料基础上，写成《汉书》初稿；次兄班超投笔从戎，出使西域，建功立业。“蒙先君之余宠，赖母师之典训”，受家庭环境熏陶，加之聪明好学，班昭熟读儒家经典著作，尤其精通史学、天文、地理、算术等，文史功底深厚扎实。14岁，班昭嫁给同郡的曹世叔为妻，世叔不幸早逝，班昭早寡，守志悉心教子成人。汉和帝永元四年（公元92年），年仅14岁的和帝，一夜之间铲除了专权的外戚窦氏家族，并追查窦氏同党。班固曾经受过大将军窦宪的赏识，受到牵连，被仇家洛阳令种兢逮捕下狱，结果，《汉书》未及完成，班固便因祸病死狱中。汉和帝命令班固之妹班昭住进东观藏书阁，续写完成此书。《汉书》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，要将这样一部恢弘博大的史书整理续修出来，谈何容易？班昭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劳动，也展示了她卓越的才华。对原文进行仔细校对的同时，她整理散乱篇章，将班固尚未书



写的《天文志》和“八表”补写完毕，历时数十载，终于成稿。今天，我们读《汉书》，无论从修辞文法，还是内容写法，丝毫不见前后不相统一之处，说明班昭下了很大功夫将原稿修改串联，才使得全书和谐统一。

宫邸女师“曹大家”

正是这次奉命续史，给了班昭从教的机会。其间，汉和帝经常召其入宫，“令皇后诸贵人师事焉”，也就是让皇后和贵人们以班昭为老师，学习儒家经典和天文算术。从此，班昭便成了宫邸学校的老师。班昭教学，注重循序渐进，她认为身教胜于言教，所以对自己的言行举止非常注重，衣着整洁简朴，不求华丽，而“礼义居洁，耳无涂听，目无斜视，出无冶容，入无废饰”。为了表示尊敬，宫中称其为“大家（音gū）”，因丈夫姓曹，故世称“曹大家”。班昭在教授后妃学习的同时，还在东观藏书阁著书。《汉书》初成后，许多人读不通，就连以博通天文数学著称的经学大师马融也未通，因此而拜伏东阁下，成为班昭弟子，跟随她学习《汉书》。至此，班昭开女师私人设教之先河。而大教育家郑玄以马融为师学习天文历算，可以说是班昭的徒孙了。

在汉和帝的贵人之中，有个叫邓绥的，是太傅邓禹之女，从小熟读经史，她和班昭很是投缘，两人很快发展成“忘年闺蜜”。邓贵人在班昭的教育下，小心翼翼伺候皇帝和皇后，隐

忍吞声，“从曹大家受经书，兼天文、算数”。邓贵人以此柔弱之性，后来一举登上皇后宝座，临朝称制，执政18年之久，陪伴左右的班昭是有一定功劳的。邓太后临朝听政后，特许“闺蜜”班昭参与政事。作为“太后师”的班昭，兢兢业业，为政勤奋，邓太后非常满意，破格加封班昭之子曹成为关内侯，官至齐国的国相。班昭70余岁去世，由于她生前“谦让恭敬，先人后己”，海人不倦，深得宫中上下爱戴，死后举朝哀痛，邓太后为她穿素服，史载“皇太后素服举哀，使者监护丧事”，可见二人感情之笃。

《女诫》人间自可传

班昭在做“女师”的同时，还编撰了世界教育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女子教育专著——《女诫》。全书共7篇，包括卑弱、夫妇、敬慎、妇行、专心、曲从、叔妹，1600余字，流传千年，经久不衰，后世有许多跟风模仿之作，但都难以望其项背。《女诫》在继承总结前人女教基础上，结合自身体验，所形成的系统性女教思想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传播性。

班昭作《女诫》时，已年过半百，疾病缠身，人生际遇给她带来对生命的无限感悟。她幼年丧父丧母，长兄班固死于非命而事业未竟，次兄班超自西域归来后不久病逝。余痛未消的班昭，悟出许多人生哲理。《女诫》序言中开宗明义：“吾今疾在沉滞，性命无常。念汝曹如此，每用惆

怅，间作女诫七章。”她指出写作此书的目的，是担心家中未嫁的女儿没有受过好的教育和教诲，不懂妇德礼仪，出嫁后，会辱没宗族，丢夫家的脸面。然而，班昭14岁嫁给曹世叔，写作《女诫》时，“执箕帚于曹氏，今四十余载矣”，据此推算，她不可能有待字闺中的女儿，所谓为未婚诸女而作，显然是一种假托。

班昭一生历东汉武帝、明帝、章帝、和帝、殇帝、安帝等六位帝王兴衰更替，尤其是做“官邸师”的那些年，对后三位帝王的家事、宫事、国事，了如指掌，甚至作为“太后师”而参与其中，亲眼目睹从窦氏专政到邓氏擅权，一个个后妃因权力斗争而致朝政腐败，外戚专权导致国家日益衰落。因此，她写《女诫》的真实目的，是希望通过对宫廷女性的教育，达到稳定政局、重振朝纲的局面。她以“卑弱”为第一章，引用《诗经》里的句子作为开篇，强调女性社会地位卑弱，在劣势的人生境遇下，应该以谦顺柔弱取胜，可谓用心良苦。而邓太后便是验证这一理念的最好的学生。“谦卑”是全书的基调，“谦让”是生存智慧，“无位而有道”是最终目的。从中可以看出，写作《女诫》的目的绝不仅仅是为教导女儿做个好媳妇。另外，对“教男不教女”的古代教育体制，班昭明确提出了抗议——“独不可依此以为则矣”，她认识到了女性教育对国家、对社会的重要性。

《女诫》成书后，一时洛阳纸贵，京城世家争相传抄，以其作为家庭女子教育的范本。当然，成书于汉代的《女诫》，作为女性教育教材的鼻祖，其思想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，充斥着“男尊女卑”“三从四德”等封建伦理观念。然而，看待历史人物，尤其忌讳以今人之眼光的“苛责”，而应放宽历史的视界，报以“同情之理解”。班昭的思想被后世统治者巧妙利用，位列“女四书”之首，成为“文教”工具，在历经1800多年的传承过程中被政治化、神学化，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，并非完全是《女诫》本身的教育思想问题。

总之，东观续史、赋颂并嫔的班昭，以女史、女师的双重身份，理应在教育史、文学史、史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。



治国之信

□ 王 涛 车 耳

公元前221年，秦王嬴政历经十余年时间横扫六合，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国家——秦帝国。在这一历史伟绩的背后，是秦国多年来政治、经济、军事等综合国力全面超越其余六诸侯国的结果，而这一切则起源于多年前的一场变法和一次震撼人心的举措。

如果从后世的观点评价秦国的强盛，人们多将此归结于四塞之地、关中粮仓、民风彪悍等因素。但在当时，秦国却属于文化的荒漠，国力衰弱，尤其是在秦孝公继位初期，国土东边的战略要冲被魏国占领，极大地消耗了国内的军事支出。因此，秦孝公即位初期，即颁布《求贤令》，广泛搜罗人才并提出：“不论是秦国人或外来的客人，谁要是能想办法使秦国富强起来的，就封他做官。”

在秦孝公的号召下，有一个在魏国不得志名为公孙鞅的卫国人来到秦国，托秦孝公宠臣景监引荐，见到了秦孝公，并提出了后来施政的一系列改革方案，包括：废除县、土地私有、荒地移民、重农抑商、土地度量等内容。秦孝公完全同意商鞅的主张，但由于改革触动了朝内贵族和大臣的利益，因此反对声此起彼伏，秦孝公担心刚继位政权不稳，改革于两年后才启动，并由商鞅主持。

改革初期，商鞅起草了一个改革

的法令，但是怕老百姓不信任他，不按新法令去做。于是在都城的南门竖了一根三丈高的木头并下令：“谁能把这根木头扛到北门去的，就赏十两金。”不久，南门口便围了一大堆人，大家议论纷纷。有的说：“这根木头谁家拿得动，哪儿用得着十两赏金？”有的说：“这大概是左庶长（商鞅）成心开玩笑吧。”大伙儿你瞧我，我瞧你，就是没有一个敢上去扛木头的。商鞅知道老百姓还不相信他下的命令，就把赏金提到五十两。没有想到赏金越高，看热闹的人越觉得不近情理，仍旧没人敢去扛。正在大伙儿议论纷纷的时候，人群中有一人跑出来，说：“我来试试。”他说着，真的把木头扛起来就走，一直搬到北门。商鞅立刻派人传出话来，赏给扛木头的人五十两黄澄澄的金子，一分也没少。这件事立即传了开去，一下子轰动了秦国。老百姓说：“左庶长的命令不含糊。”

商鞅知道，他的命令已经起了作用，就把他起草的新法令公布了出去。新法令赏罚分明，规定官职的大小和爵位的高低以打仗立功为标准。贵族没有军功的就没有爵位；多生产粮食和布帛的，免除官差；凡是为了做买卖和因为懒惰而贫穷的，连同妻子儿女都罚做官府的奴婢。秦国自从商鞅变法以后，农业生产增加了，军事力量也强大了。不久，秦国进攻魏

国的西部，从河西打到河东，把魏国的都城安邑也打了下来。公元前350年，商鞅又实行了第二次改革，其中的主要政策是：废除井田制度，放开土地买卖；建立郡县制度；迁都咸阳。这样大规模的改革，势必会引起激烈的斗争。许多贵族、大臣都反对新法。有一次，秦国的太子犯了法。商鞅对秦孝公说：“国家的法令必须上下一律遵守。要是上头的人不能遵守，下面的人就不信任朝廷了。太子犯法，他的师傅应当受罚。”结果，商鞅把太子的两个师傅公子虔和公孙贾都办了罪。这样一来，一些贵族、大臣都不敢触犯新法。这样过了十年，秦国果然越来越富强，周天子打发使者送祭肉来给秦孝公，封他为“方伯”，中原的诸侯国也纷纷向秦国道贺。

商鞅变法是我国历史上一次十分著名的改革，其改革内容具有划时代的意义，通过此次变法极大提高了国家的经济实力与军事储备，一举奠定了秦国的霸主地位，也为后世的“大一统”战争打下了坚实基础。虽然与商鞅推行变法的同期还有不少国家也推行了相似的改革，比如赵国的“胡服骑射”、楚国的吴起变法，但从最终结果来看，都没有秦国所具有的全面性和彻底性。究其原因，就在于国家变法中政府信用的差异性。

在城门立木的故事中，表面上看

只不过是商鞅委托他人搬运木头的购买劳务行为，但是背后的深意却如故事叙述中所说，是以夸张的诉求确立起言而有信、说到做到的政府形象，可以说商鞅花钱购买的不是劳务，而是民众对政府的信心。立木为信的结果很显著。一方面，通过这样的举措很快建立起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，大家相信政府改革所许诺的预期，从而有效引导与激励人们从事于农业生产和军事战争中去；另一方面，政府的诚信必然会促成社会的“法治”，从而极大地保障了随后改革的顺利进行。

因此，可以说立木为信的故事讲述的并不是单纯的个人信用，而是政务诚信。从现代的信用制度理论来看，政府诚信是社会诚信体系的重要保障。孔子云：“政者，正也。子帅以正，孰敢不正？”政府的一举一动不仅影响到其自身形象，还具有社会引导作用，成为普通群众做人做事的标准。政府诚信还关系到政府公信力，即政府的影响力与号召力，政府公信力反映了公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和信任度。良好的政府公信力与高度的政治认同相联系，政府公信力处于良好状态，也就表明社会具有普遍的政治认同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法律权威能得到普遍尊重，公共政策能得到广泛性认同，政务目标能更加容易实现。

信用故事

咏史诗作为王安石诗歌中的一类重要诗作，在各类诗体里，最能体现出作者对历史的理解和对待历史的态度。这一类诗作，对我们了解王安石的历史观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and 意义。

对历史规律的总结

王安石在咏史诗中，曾咏汉文帝、张良、扬雄、司马迁、诸葛亮等诸多历史人物；评价过项羽自刎、昭君出塞、宰割辽国等众多历史事实。往往寄谏于诗，从历史中吸取丰富的知识充实自己的思想，以更好地深入当下与未来。王安石对勤政兴国、逸乐误邦的历史规律有着自己深刻的认识。如《金陵怀怀四首》（其一）：

霸祖孤身取二江，子孙多以百城降。豪华尽出成功后，逸乐安知祸与双。东府旧基留佛刹，后庭余唱落船窗。黍离麦秀从来事，且置兴亡近酒缸。

金陵曾是吴、东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六朝的都城。六朝灭亡的原因不尽相同，但一部分原因都是王朝建立者子孙的贪图享乐，不顾朝政。这一题材历代都有涉及，但此诗中，王安石的高度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对朝代更替的感慨与喟叹式的怀古，而是从中发现了她于政事可以兴国，坐而享乐难免误邦的普遍规律。这和杜牧《阿房宫赋》中“族秦者，秦也，非天下也”的认识是相通的，都表达了荒淫自误的历史规律。王安石晚年虽曾被佛老思想所影响，但他的一生始终贯穿着儒家济世救民的精神。此诗亦可看出作者对北宋中期政治的顾虑，和他忧世济民的思想。诗中最后两句，写盛衰兴亡相继的历史规律是很难改变的，既然如此，那么便把酒一杯，抒发怀抱。这样，王安石就超出了一般咏史诗对历史的认识。历史的发展并非是由个人的意志主观决定的；而是通过对历史规律的认识和尊重在曲折中前进发展的，体现了王安石对历史规律的深刻见解。

王安石对历史的形势也有一定的理解。如《读后汉书》一诗：

铜鉴纷纷果是非，当时高士见精微。可怜窦武陈蕃墓，欲与天争汉鼎归。

东汉桓帝、灵帝时，窦武、陈蕃等士大夫对宦官乱政的现象不满，对宦官集团进行了激烈的抨击。他们品德高尚，时称君子。“天”，指出两方长期的竞争和君王的心意所在等因素积累形成的整体形势。王安石在此诗中认为，当时的形势对反宦官的士人们是不利的，这就决定那些正直君子的抗争，已经不能挽回汉朝的命运。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中评述道：“天下无道，君子囊括不言，以避小人之祸，而犹或不免。”但窦武陈蕃等人，在“天下无道”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所为，不因大势所向而灰心放弃。这一点则让同为政治家的王安石不禁深深理解和惋惜，从而发出“可怜”之叹。

王安石对民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也十分重视。如《乌江亭》《范增》等咏史诗，都无一例外地强调了民众的不可忽视和重要性，阐明了历史上的胜利者一定都是民心所归的道理。项羽和范增都没有真正认识到这一点，因而都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失败。

王安石关于历史规律的思想颇有见地，体现了他对历史的深入思考和清醒认识。

对历史的独到见解

王安石作为一个政治家，看待历史总有独到的角度和新颖的见解。这在他咏史诗中有特别的体现。如《读史》：

自古功名亦苦辛，行藏终欲付何人？当时黯黯犹承误，未俗纷纷更乱真。糟粕所传非粹美，丹青难写是精神。区区岂尽高贤意，独守千秋纸上尘。

这首读史诗在王安石咏史诗中具有重要的地位，是鲜明地体现王安石历史观的代表作品。在此诗中，王安石怀疑历史的真实性。开头先写功名难得自古而然，但身后的记载出自谁笔下却不得而知。后面写由于情况的复杂和各说纷纭等，记载往往就很难忠于事实。认为传下来的并非都是“粹美”，而极有可能是“糟粕”。“丹青难写是

王安石咏史诗中的历史观

□ 李闫如玉

精神”一句颇有哲理。“丹青”原意是绘画，这里指史书。先圣贤哲的精神气质和原本意图，在流传至今的史册记载里已经很难体现了。不明当时具体的今人，只好空对着千秋纸上的尘埃，遥想高贤的风采和美意。整首诗不落窠臼，表现了王安石对历史及记载的怀疑和批判精神，体现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。《读汉书》一诗：

京房刘向各称忠，诏狱当时迹自穷。毕竟论心异恭显，不妨逆国略相同。

这首诗则体现了王安石看待历史时全面、立体的角度。京房是西汉学者，好说《易》，通过讲灾变的方法，获得汉元帝的信任；刘向也论灾异，并且有意使用五行阴阳等等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。恭、显指弘恭、石显，都是汉元帝时的宦官。二人当朝弄权之时，刘向上书称有奸邪作乱，因而灾异频发，请求汉元帝有所行为。王安石看到，在出发点上，两方是根本不同的，刘向力图使君上不要惑于小人，而恭、显则误国误君。王安石更进一步作出了分析。他看到，虽然刘向的本意是好的，但因为他用毫不可信的灾异之说来达到目的，所以后果与恭显之辈并无二致。小人会误国，君子也可以因为举错失当而迷邦。作者用政治家的眼光来分析历史，高瞻远瞩，思考全面，不因一个人物本身的正直操守，而忽略他对国家所起的负面影响。王安石对历史的看法和观点是全面、整体的，没有偏废。

再如《读唐书》一诗：志士无时亦少成，中才随世就功名。并汾诸子何为者？坐与文章立太平。

这首诗认为，时代的大背景对于处在其中的个人具有重大的作用。有才的志士没有“时”的作用，是不能有什么大作为的；但若在一个良好的历史环境下，就算一个人只有中等的才能，也可以功成名就。通过对两种人的对比，鲜明突出了“时”“世”的作用和重要性。末两句作者举出了相应的实例。并、汾的那些人并没有出众的才能，却也可以坐享这太平盛世。王安石通过比较和举例，提出了特定的时代和历史的背景，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人成就的独到见解。王安石看待历史独特的思维和方法，反映在他对历史的独到见解里，又鲜明地体现在他的历史观中。

